

国外经济学者 论中国及发展中国家经济

《经济研究》编辑部 编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经济研究》丛刊

国外经济学者
论中国及发展中国家经济

《经济研究》编辑部 编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经济研究》丛刊
国外经济学者
论中国及发展中国家经济
《经济研究》编辑部 编**

*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北京印刷二厂印刷**

*

880×1168毫米 32开本 5.625印张 132,000字

1981年12月第1版 1981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13,000

统一书号：4166·330 定价：0.70元

目 录

前言	编者(1)
一个美国人对中国经济的展望美国哈佛大学国际研究所所长 D.H. 帕金斯(2)	
教育与经济发展之比较观美国加利福尼亚-伯克利大学农业和资源经济学教授 I. 埃德曼(24)	
计划工作与不确定性美国斯坦福大学肯尼讲座教授 K.J. 阿罗(46)	
欠发达国家环境保护计划的利益—费用分析美国哈佛大学政治经济学威尔斯讲座教授 R. 多夫曼(59)	
中国经济计划的计量经济学模型概要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 邹至庄(80)	
国际贸易和资本流动发展趋势 世界银行分析计划部主任 H. 休斯(103)	
资料、计划和刺激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 J.J. 斯梯格利茨(126)	
南斯拉夫经济的结构与概况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经济系助理教授 L.A. 泰森(139)	
基本需要 美国波士顿大学经济系教授 P.P. 斯特里顿(165) 亚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Special Issue of "Economic Research"

Introduction	Editor (1)
An American View of the Prospects for the Chinese Economy	Dwight H. Perkins (2)
Educ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Irma Adelman (24)
Planning and Uncertainty	Kenneth J. Arrow (46)
Benefit/Cost Analysis of Environmental Programs	Robert Dorfman (59)
Outline of an Econometric Model for Chinese Economic Planning	Gregory C. Chow (80)
Trends in World Trade and Capital Flows 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China	Ronald Duncan and Helen Hughes (103)
Information, Planning and Incentives	Joseph E. Stiglitz (126)
Yugoslavia's Economic Structure and Performance: An Overview	Laura D'Andrea Tyson (139)
Basic Needs: The Lessons	Paul P. Streeten (165)

前 言

1980年11月，在美国威斯康星州的拉森，举行了“美中经济发展战略抉择讨论会”。参加这次会议的，中国方面有以许涤新为团长的十位经济学者，美国方面有W·A·路易斯等十九位经济学者。本刊在这一期刊登的九篇国外经济学者的论文的中文译稿，大部分选自这次会议上美方的发言，一部分是参加这次会议的外国学者为本刊撰写的专稿。这些文章涉及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带有共同性的若干经济理论问题，其中有的文章还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战略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我们期望国内广大读者，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出发，有分析地阅读这些文章，从中汲取可资借鉴的内容，并且增进对西方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的了解。有的文章，本刊在发表时作了个别的删节，特此申明。对所有这些文章的作者，在此表示深切的谢意。

《经济研究》编辑部

1981年7月

一个美国人对中国经济的展望

美国哈佛大学国际发展研究所所长 D. H. 帕金斯

任何人都不能充分了解一个国家国民经济的所有方面。对某一经济部门或地区的详尽了解，往往造成对其他部门或地区的忽略。经济学家常常必须作出选择：要就是尽量对宏观经济趋向进行一种广泛的了解，或者对某些特殊的微观经济问题作深入的分析，以便对制定政策提供建议。

一个从局外观察中国的外国人，要想充分了解情况，提出政策方面的建议，几乎是不可能的，我在这里也不打算尝试。不过局外人士也有一种长处：他们站在一定距离之外观察中国经济，就比较不容易受到个人经验的局限，这种个人经验有时很可能缺乏代表性。此外，他们根据在其他国家生活和工作过的经验，也许还能用一种比较的眼光来看问题。

因此，这篇文章代表我个人对中国经济在八十年代所面临的两大问题的一些看法。经济增长的速度会有多大？什么人会在这一增长中获利、什么人会被抛在后面？这两个问题又引伸出第三个问题：经济改革可能会搞到什么程度？它对经济增长和利益的分配会产生什么影响？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所使用的资料，大部分以国家统计局正式公布的数字为依据。然而，在许多重要的场合，得不到数字材料，或者必须进行换算以适合于分析的特殊需要，在这种情况下

下，所使用的一系列数字材料基于个人的解释，无疑会存在一些错误。不管怎样，我们希望这样得来的数据尽量接近于真实数字，而不致得出歪曲的结论。

迅速增长的前景

探讨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问题，有各种不同的方法。首先，可以根据中国过去的情况，分析一下为什么过去的增长没有更快些或者更慢些，以便推测今后可能发生什么情况。

表1和表2是对中国国民总收入以及各部门的增长的估计。经济学家经常把国民收入看成明确的物质概念，就如同小麦和钢铁的吨数一样。然而，不管是根据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西方的定义，国民收入在理论上都是由价格和数量两种因素构成的。为了排除不同时期价格变化的影响，国民收入通常以某一年的不变价格来计算，这就出现了究竟选哪一年为基期的问题。这个问题对估算中国国民收入非常重要，这倒不是由于通货膨胀，因为中国的通货膨胀率很低，而是由于相对价格的重大变化，特别是工农业产品之间比价的变化。

由于农产品收购价稳步提高（“剪刀差”缩小），农业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按最近年份（如1978年）的不变价格计算比按早先年份（如1952年）的不变价格计算就要大些。这样一来，就影响整个国民收入的增长率降低了1%或稍多一点。表2显示出这个估计数值。

哪套不变价格是“正确”的？从经济理论的角度来看，两者都可以说是“正确”的。可是要用来预测未来，那么1952年的价格就有缺点。1952年的价格，在某种程度上还反映着战争遗留下来的后果——相对于农产品的价格来说，工业品价格偏高。因而，后

表1

国民收入的结构

年份	国民收入		净 产 出					
	(十亿元)	%	农 业 (十亿元)	%	工 业 (十亿元)	%	其 他 (十亿元)	%
(按1952年不变价格计算)								
1949	36.02	100.0	24.35	67.6	4.50	12.5	7.17	19.9
1952	61.13	100.0	36.19	59.2	11.00	18.0	13.94	22.8
1957	93.53	100.0	46.07	49.3	27.28	29.2	20.18	21.6
1962	79.90	100.0	33.99	42.5	29.83	37.3	16.09	20.1
1965	119.94	100.0	—	—	—	—	—	—
1976	230.32	100.0	—	—	—	—	—	—
1978	280.12	100.0	64.78	23.1	178.25	63.6	37.10	13.2
1979	299.45	100.0	—	—	—	—	—	—
(按1978年不变价格计算)								
1949	54.15	100.0	40.30	74.4	3.55	6.6	10.30	19.0
1952	88.60	100.0	59.89	67.6	8.68	9.8	20.03	22.6
1957	126.77	100.0	76.25	60.1	21.52	17.0	29.00	22.9
1962	102.91	100.0	56.25	54.7	23.54	22.9	23.12	22.5
1965	—	—	—	—	—	—	—	—
1976	—	—	—	—	—	—	—	—
1978	301.10	100.0	107.20	35.6	140.60	46.7	53.30	17.7
1979	322.12	100.0	—	—	—	—	—	—

资料来源：以1952年不变价格计算的五十年的数字，和1978年的数字，是根据中国正式公布的材料，例如杨坚白、李学曾合写的《中国农、轻、重之间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2期），以及在中国官方数字基础上所作的研究，特别是石川滋（Ishikawa Shigeru）的《中国大陆的国民收入和资金积累》（东京，1965年出版）。其他数字是根据下述方法得来的。

计算方法：1962年及以后各年度按1952年不变价格计算的数字，是根据公布的国民收入，农业、工业净产值与基期相比上涨百分率推算出来的，基期净产值也是以1952年不变价格计算的。“其他”是国民收入减去工业、农业数字后的余数。

按1978年不变价格的估计数，首先需要根据部门的物价指数进行折合。这个折合率是按1978年价格计算的1978年的净产值，除以按1952年的价格计算的净产值计算出来的。这些折合率，农业为1.655，工业为0.789，其它为1.437。用以上这些折合率对以1952年价格计算的净产值进行换算，就可以得到每个年度用1978年价格表示的净产值。再把用1978年不变价格计算的各个部门的数字加在一起，就得出了以1978年不变价格计算的国民收入总值。

表 2

增 长 率

(年增长率, 以%表示)

	国 民 收 入		净 产 值	
	按1952年 不变价格	按1978年 不变价格	农 业 (按1978年 不变价格)	工 业 (按1978年 不变价格)
1949—1978	7.3	6.1	3.4	13.5
1952—1978	6.0	4.8	2.3	11.3
1957—1978	5.2	4.2	1.6	9.3
1962—1978	8.2	6.9	4.1	11.8

资料来源：这些年增长率是从表 1 的数字中得来的。

来年份的价格（如1978年），更好地反映了各种商品的相对稀少性。因为中国已从不正常状态完全恢复过来，并已开始迅速实现工业化。^① 为了达到本文的目的，最好还是用1978年的价格，因此近二十年来每年平均增长率可定为4.5%左右，这是对中国国民收入增长率比较准确的估计。

到底4.5%是偏高还是偏低，决定于人们的看法如何。这个增长率远远高于中国1949年前所达到的增长率。事实上，不论是欧洲还是美国，在1945年前都花了很长时间才达到这样大的增长率。另一方面，一些东亚国家和其他地区，特别是日本，在五十年代以及后来，都达到了比这高得多的增长率。每年9—10%的增长率是不寻常的，但也并不少见。4.5%和9%之间的差别，如果持续很长一段时间，那就相差很大了。二十五年之后，按4.5%增长的国家，国民收入只提高到3倍，而按9%增长的国家，国民收入则提高到8.6倍。

然而，这里值得注意的问题，不在于4.5%的增长率是高还是低，而在于过去的增长率在预测中国经济的未来时意味着什么。首先，取得这一增长率的时期，中国曾经历了大跃进年代中计

划和管理方面的严重错误，苏联在1960年突然撤回了技术人员，以及文化革命的干扰破坏。读者一定比我更能判断这种经济上的破坏在今后发生的可能性。不过，将来再重复如此大规模的破坏，看来是不大可能了。不管怎样，这篇文章的分析是假定中国的政治形势在今后一、二十年中基本上保持稳定。

如果中国的政治形势保持稳定，除非出现带有根本性的经济阻碍因素，中国经济增长率不大可能低于每年4.5%。如果没有这些因素，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一定能加速达到每年6%或者更多。那么这种可能出现的经济阻碍因素到底是什么呢？其严重程度又会怎样？

经济增长的源泉

中国经济在八十年代初期所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之一是：许多产业工人的劳动生产率太低和经济管理效率不高。这些问题虽不比许多其他发展中国家或发达国家存在的问题更糟，然而却是严重的。

衡量这个问题重要程度的一个办法，就是将中国的生产率同那种在劳动生产率或管理效率方面几乎不存在问题的国家进行比较——例如日本。传统的劳动生产率计算方法（净产值除以工人人数）在考虑这个问题时不会有太大帮助。因为劳动生产率在不同国家中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差别，可以归咎于装备水平的不同。某种“全部要素生产率”（净产值÷全部要素投入）的概念是需要的，这里最好是使用西方所谓的“增长的计量”，或者所谓“增长源泉的分析”。

所谓“增长的计量”，就是用一个传统的生产函数把商品和劳务之间的投入产出之间的关系表示出来^②；

$$O = F(K, L, t)$$

在这里：

O = 产出

K = 生产资料投入

L = 劳动投入

t = 时间的推移，亦即生产率的增加

采取微分方法和一定的假设，这个方程式可以很方便地改变成以下形式：

$$G_0 = t + W_K G_K + W_L G_L$$

在这里：

G_0 = 总产值或国民收入的增长率

G_K = 生产资料的增长率

G_L = 劳动就业的增长率

W_L = 工资和农民收入在整个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

W_K = 在整个国民收入中不属于劳动收入的部分

t = 不能用投入的增长来解释的产出增长，叫做“剩余”

对中国来说，从1952年到1978年这段时间里，国民收入增长率用1978年的价格计算，每年大约是4.8%。从1949年起，中国人口每年平均增长率为2%。这些增长的人口在六十年代后半期进入劳动力的行列。考虑到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期劳动力增长率较低，中国在从1952年至1978年这段时间里，每年劳动力平均增长率为1.5%左右。由于劳动力质量的改进和就业比例的提高，我们把实际就业增长率提高为2%左右。经济学家——至少是那些国外的经济学家不了解，中国生产资料到底有多少。不过最近公布的数字表明，中国的积累率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率是逐步上升的，所以生产资料的增长也许比国民收入的增长更快。为了说明问题，假定 G_K 为6.0%。关于 W_L 和 W_K ，所占的权数分别是0.7

和0.3,它们的总和应为1.0。^⑧这种权数和日本有相似之处。但是,在劳动力过剩的发展中国家里劳动力收入的权数似乎应当低些。

因此,表3中对中国“生产率”的估计,是很不成熟的,所用的方法不管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有问题。不同的假设会得出稍稍不同的结果。这种方法虽然很不成熟,但是也可以得出一些结论。首先,中国的要素生产率是有所增长的,除非我们对生产资料增长的估计远远低于实际数字。其次,生产率虽有所增长,但也不可能太高,甚至不可能超过美国,虽然剩余率略有差别,可能是由于数字的误差和计算方法的不同。中国在生产增长率方面明显地远低于日本和其他一些高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例如南朝鲜,它的数字可能跟日本差不多。近年来,美国的生产率增长速度下降了。七十年代的剩余比表3中的数字要低得多。

一般来说,人们不指望先进的工业化国家在生产率增长速度上象新兴工业化国家那么快。如果一个国家已经接近人类知识目前达到的最高点,而且几乎没有工人可以从那些低生产率的传统行业转移到现代化部门中去,要取得技术上的进展是比较困难的。发展中国家比较容易采用国外适当的新技术,同时有大量的劳动力可以从农业生产中解放出来,而不会对农业生产有多大影响。

因此,从这些比较中可以得出的另一条结论是:当中国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投入迅速增长时,却没有很好提高这些投入的生产率。换句话说:如果中国能够纠正那些使生产率不正常低落的错误,那么它的增长速度应当能够快得多。

这篇文章并不试图指出,哪些部门生产率的问题特别严重,或是提出改革的建议。不管怎么说,生产低速增长的主要根源是无可怀疑的。表4中积累与国民收入增加之比表明,只有在大跃进和文化革命这两个时期,出现了最严重的问题。在这些时期中,生产资料投资的大规模增加,使国民收入仅有微弱的增长,

表 3

增长核算比较

	中国* (1952—1978)	日本 (1943—1971)	美国 (1948—1969)
国民收入增长率 (G_0)	4.80	8.81	4.00
其中：由于劳动力的增加 ($W_L G_L$)	1.40	1.85	1.30
由于总资本的增长 ($W_K G_K$)	1.80	2.10	0.79
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余数)	1.60	4.86	1.91

* 这些计算仅仅是作例证用，可能会有较大误差。

来源：对中国的估计请看正文中的讨论。对日本和美国的估计来自爱德华·F·丹尼逊和威廉姆·K·重恩所著《经济增长及其源泉》，见H·帕特里克斯和H·拉索夫斯基编《亚洲的新巨人：日本经济是怎样运行的》。华盛顿布鲁金斯研究所1976年，第98—99页。

在某些年份中甚至毫无增长。因此，似乎可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能避免1958—1960年、1966—1976年这两个时期出现的严重错误和大规模破坏，这就足以造成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

然而，避免那些破坏并不是唯一的手段。只要提高工人、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让工厂管理人员更加注意降低成本，这一切都会大大提高生产率。过分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所造成的问题，应该另行专题讨论，在这里不能详细探讨。不过，从苏联的经验来看，有一条教训值得吸取——那种体制虽然在动员人力物力方面很有效，但对这些投入的利用却相当浪费。此外，在发展过程中，能够动员人力物力的优越性，越来越多地被浪费和官僚主义的无能所抵销了。因此，假如中国经济体制朝着更灵活和关心效率的方向改革取得了成功，生产率也应当相适应地提高。

最后，在引进外国先进技术方面去掉严格的限制，会提高新技术的生产率。因为中国经济庞大，工农业所需的大多数设备将继续由本国生产，但对那些在国内即使可以生产，但成本极高的项目，不如进口更为合算。

表 4

积 累 的 收 益

时 期	积累占国民收入的比率 (%)	每百元积累造成的新增 国 民 收 入 (元)
1953—1957	24.2	35
1958—1962	30.8	1
1963—1965	22.7	57
1966—1970	26.3	26
1971—1975	33.0	16
1976	31.1	-9
1977	32.3	27
1978	36.5	33
1979	33.6	32

资料来源：董辅初，《中国经济发展中积累与消费的关系》。

农 业 问 题

美国和中国有些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制度的改革，例如进一步发挥价值规律及市场调节的作用，对农业生产会产生象工业生产一样显著的影响。对此观点，有些美国经济学家持有异议，我也是其中之一。我们并不是说：提高买价，发挥自由市场作用和采取一些其它措施会起消极作用。适得其反，如不提高农民这方面的积极性，情况也许更糟。我们的意思是说，提高积极性和更有效地决定哪些土地最适宜种粮食，哪些最适宜种经济作物，这只能部分解决问题，而中国农业方面根本性的问题是属于技术性质的。

对农业增长前景的任何讨论，首先必须分清各种农业收入，其中包括农村工业净收入，经济作物及粮食作物收入。毫无疑问，近郊地区，尤其是能够广泛接受城市企业加工定货的近郊地

区，农村工业会发展很快。同时不难想像，经济作物会发展很快，特别当农民能把土地从种粮食挤出来改种经济作物时更是如此。在日本、南朝鲜等国，这方面的改变对迅速提高农民平均收入起了很大的作用。

问题在于粮食，这要从供求两方面分别进行考虑。从需求方面说，由于人口、收入的增长，直接和间接对粮食的需要都会稳步增长。粮食提供热量，这是其它物质不能代替的。肉虽也能提供热量，而且猪和鸡可以用废料饲养，牛可以吃草，但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要增加肉食产量，就要多种饲料来喂养牲畜。实际上要用几公斤粮食才能换取一公斤肉。具体比例视畜种和品种而异。要想增加中国的肉食供应就会对粮食的需求造成很大影响。对粮食或肉类采取定量配给都能控制消费的增长，然而配给的办法会破坏工人工资和农民收入增加的鼓励作用，因为挣得再多，生活也不能改善。据保守的估计：在今后十年或更长时间内，中国粮食需求量，平均每年增长3%。^④

每年要增长3%，也就是1千多万吨粮食从何而来呢？一种可能就是不断依赖进口粮食及肉类。例如日本，1976年进口了大约2千多万吨粮食，平均每人大约180公斤。南朝鲜进口三百万吨，平均每人大约85公斤。只要简单地举出这些数字就可以看出，中国不能走这条路。中国要是按日本、南朝鲜这样的每人平均数量购买粮食，每年就要进口粮食1.85亿吨或8,500万吨。这样庞大的进口量会使世界粮食价格暴涨，同时，中国将无法支付这笔外汇。

因此，粮食需求量的增长，只能靠国内自给。可是采取什么办法呢？最好是扩大耕地面积。但那些适宜种粮而尚未利用的土地是极其有限的。中国，同东亚其它一些地区一样，是迅速开辟新的耕地以抵消现有耕地被城市、道路等用途占用的趋势。要想

扩大耕地面积的希望很小。大部分粮食产量的增加必须依靠单位面积产量的提高。

中国粮食亩产为何不能稳步上升，并没有什么生物学上的原因；但不是很快、很容易得到解决的。首先，文化革命期间所造成的中国农业科学研究方面的损失，需要时间来弥补。在中国现有条件下，特别要花费时间来培育各种新品种，因为根据国际标准，现有品种的单位面积产量已达到很高的水平了。五十年代及六十年代初，中国植物学家们显示了他们有能力赶上国际科研最高水平。但十年时间损失了。今天，许多农业试验站的产量仅略高于先进的公社大田的产量。如果要取得很快的发展，实验田的产量应比最好的农场产量高得多。

随着各种高产作物的栽培，不断需要增加各种辅助性投入的数量，包括更多地使用化肥及农药。然而，在中国许多可耕土地上，最严重的问题是缺水，特别是西北地区。外国人很难预料，而我认为：动员劳力建设小水库、挖渠开沟来扩大灌溉面积的做法，已经是做完了。今后要进一步保证大量的农业用水，就得制定规划排除黄河的淤泥，实行南水北调或其他大规模的工程，这就需要大量投资，而且也需要时间。

近几年中，中国报刊文章指出，过去强调地方粮食自给，使许多土地利用效率不高，因此只要结束这种极端的做法，产量就会大幅度上升。显而易见，这方面的错误对经济作物产量可能有很大影响，例如把好的棉田或蔗田改种粮食就是一个例子。但是过去适宜种粮而改种经济作物的土地到底有多少，能否影响全国粮食产量水平，就不太明显了。因地制宜实行专业化，粮食产量也许会有所增长，但不可能出现奇迹。

中国很可能每年粮食产量持续增长4%，但更有可能不足4%。日本和南朝鲜的自然条件与中国近似，而有高效率的研究